

## 日汉辞典的黎明期

沈 国威

要旨：中国は昔から字書があったが、辞書がなかった。西洋宣教師らによる辞書編纂は新しい理念を持ち込んだ。一方、初期の日本語学習では辞書は日本の国語辞書を底本に編纂された。本論文は、初期の日本語辞書を4点取り上げ、編纂方針、収録語彙、日本語学習への寄与可能性について分析し、20世紀初頭の日本語学習の環境を解明しようとした。

キーワード：外国語辞書 同文 国語 漢字

学习外语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辞典，16世纪末耶稣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为汉外辞典的编纂做努力<sup>1</sup>。1807年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伦敦传教会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接踵而来的传教士们编一本学习汉语的辞典。马礼逊不负众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三卷六册的《字典》<sup>2</sup>。马礼逊之后，较重要的英汉辞典有以下数种：

- 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1844
- 麦都思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
- 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1869
- 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3
- 邝其照《字典集成》1875
- 翟理斯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
- 谢洪赉《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2

其中，麦都思、翟理斯的辞典没有中文名，其余各种或称“字典”，或称“韵府”（也有如谢洪赉的辞典两者并用的）。对于中外在辞典体例、内容等方面的不同，严复在《英华大辞典》（1908，上海商务印书馆）序中曾一语中的地指出：

---

<sup>1</sup> 有关情况请参见马西尼，“早期の宣教師による言語政策：17世紀までの外国人の漢語学習における概況—音声、語彙、文法”，内田庆市・沈国威编《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日本：雄松堂 17~30页；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当代语言学》第9卷2007年第2期97~116页。

<sup>2</sup> 包括《字典》在内的马礼逊的一系列著作2008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基金会共同推出影印版（大象出版社），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夫西文辞典众矣，以言其卷帙，则自盈握小书，至于数十巨册；以言其说解，则自[叶且]标互训，至于历著异义引伸，与夫其国古今文家所用其字之世殊，乃至里巷谣俗。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今夫中国字书旧矣，（中略）而国朝《康熙字典》，阮氏《经籍纂诂》，集二千余年字书天演之大成，所以著神州同文之盛。虽然其书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而吾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则于是有《佩文韵府》以济其穷。字典以部画相次，而韵府则以韵为分，此其嘉惠学者，使自得师，其用意皆可尚也。（中略）而所谓辞典者，于吾字典、韵府二者之制得以合。此其国名物所以降多，而辞典所以日富也<sup>3</sup>。

严复在称赞西方辞典种类繁多、释义详备的同时，评论中国的辞典说：中国古已有字典，对每一个汉字诠释其字义、确定其字音。但是，汉语的词、习语并不都是采用单独汉字的形式，于是就有韵府一类的书对这些（多音节的）词、习语进行解释，以补充字典的不足。而西方的辞典，口语俗语，耳之所闻都加以收入，详细解释。所以西方的古典不借助注释书也可以读懂，而且西方辞典编纂的形式集中国字典、韵府的长处，使用方便。

19世纪以降西人编纂的汉外词典，多使用“字典”“韵府”等中国传统的名称，但是却赋予了西方的形式和内容，导入了全新的理念。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汉外辞典编纂，不仅为中外人士——甚至包括日本人的外语学习（英语和汉语）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而且还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有字典，无辞典的现实。但是，由于编纂力量、印刷条件等的限制，汉外词典一书难求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严复在回忆自己学习英语的经历时说：

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sup>4</sup>。

直至1908年《英华大辞典》问世，英汉词典紧张的情况才得到缓解。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中国涌动日语潮，短短几年数以千计的学子东渡日本留学。在日语教科书热卖的同时，社会对日汉辞典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但是，辞典的编纂需要时日，无法一蹴而就。加之受所谓同文思想的影响，对日汉辞典的必要性、迫切性没有正确的认识，日语学习辞典的编纂工作并没有马上开始。在日汉辞典出现之前，解燃眉之急的主要是以下几种类型的书籍：

<sup>3</sup> 《严复集》第二册，253~254页

<sup>4</sup> 《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3年。这本由谢洪赉编纂的辞典是以井上哲次郎的《英华字典》为底本的，而井上的辞典又是来华传教士罗存德《英华字典》的日本改编增订本。井上在改订时加入了6千以上的新词。谢的另一个贡献是从英语辞典中收集了大量的插图加入这本词典。

- (一) 教科书。早期的教科书本身就是一个词汇集,如《东语简要》《东语入门》主要以收录日语的语词为主。
- (二) 词汇集,尤其是“和文奇字解”。所谓“奇字”就是汉语的汉字知识无法理解的日语词,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掌握了“颠倒之法”,再记忆一些奇字就可以读日文书了。因此奇字解类的东西大行其道,具体情况请参见拙文<sup>5</sup>。
- (三) 《新尔雅》、《新释名》类的术语集。《尔雅》《释名》都是中国古代的辞书名,留学生加上一个“新”字,借用作术语集的名称。《新尔雅》出版于1903年,对数千学术词汇进行释义。详细情况请参见拙著<sup>6</sup>;关于《新释名》,梁启超1904年6月在《新民丛报》第49号为《新释名》做宣传写道:“社会由简趋繁,学问之分科愈精,名词之出生愈夥。学者有志向学,往往一开卷,辄遇满纸不经见之字面。骤视焉莫索其解,或以意揣度,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敝也,小焉则失究研学术之正鹄,大焉或釀成谬误理想之源泉,所关非细故也。是以不揣绵薄,相约同学数辈,稗贩群书,为《新释名》”<sup>7</sup>。梁原来的计划似乎是“相约同学数辈”,编纂一本释义详尽的术语集,先连载,后出单行本。但是《新释名》只在第《新民丛报》第50、51号连载两期,以大词条的形式解释“社会、形而上学、财货”后便不见下文了,终于没有出版单行本。
- (四) 日本人编纂的汉语学习辞典。第一本为日本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辞典《四声标注支那官话字典》(西岛良尔、牧相爱合编)出版于1902年。这本辞典将日语的单词及短语按照五十音排列,给出汉语译词并用假名标注发音及四声。这实际上是一种日汉字典<sup>8</sup>。4年后的1906年井上翠出版了其一系列汉语辞典的第一本《日华语学辞林》(发行者为东亚公司,其实这是日本出版社博文馆为对华销售图书而设立的公司)。时任东京宏文学院教授的井上在例言中说:“日华语学辞林者。予曾学习清国语言之暇。随听随记者。日积月累遂为一篇。乃特选择其必要者万余。解以日本俗语。欲一以为清国人士学习东语者津梁。一以为日人学习清国语言者阶梯也”。这种一书两用的方法在早期的英汉词典、教科书中也可以到相似的例子。

1905年第一本供日语学习者使用的辞典《汉译日本辞典》(1905)终于问世了<sup>9</sup>。彭文祖在1915年写的《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说“凡留学日本者。其初未有不购一册者也”(11页),可见出版10之后这本辞典仍有广大的读者。其后,《日语新辞林》(1906)、《标品字典》(1096)、《汉译日语

<sup>5</sup> 沈国威,“关于和文奇字解类资料”,《或问》第14期2008年117~128页

<sup>6</sup> 沈国威,《『新爾雅』とその語彙》,东京:白帝社,1995年

<sup>7</sup> 梁启超“《新释名》叙”,《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63~164页

<sup>8</sup> 六角恒广《漢語師家伝》,东方书店1999年224页

<sup>9</sup> 黄彬,“关于《汉译日本辞典》及其词汇”,《汉语汉文化论丛》,东京:白帝社,2008年229~248页







至末尾复举同一熟字者则示原语之处于汉语也；又说：原语之出于汉语、而异其意义者、亦不少、以若此者、不再表出之于末尾。下面来看3条具体的例子。

カク<sup>○</sup>メイ(名) 【革命】 谓政府之变革等。云尔 革命

シーヤ<sup>○</sup>クワイ(名) 【社会】 谓一党与。云尔。如曰政治社界<sup>11</sup>(为政者之党与)商人社界(商贾之党与)又谓一国。一州。一团之人民。亦云尔。

テツ<sup>○</sup>ガク(名) 【哲学】 汎谓无形理学。心理学。性理学。修身学等。云尔。

根据凡例，“革命”的下划线(原著为右侧线)表示，作为译词的“革命”出自汉语；而“社会”虽然出自汉语，由于意义变化较大没有被作为汉语来源的词处理；“哲学”则完全是日本新造的词。词条“辞书”的释义也饶有兴味，可与本文开头严复的言说相比参<sup>12</sup>。

ジ<sup>○</sup>シ-ヨ(名) 【辞書】 谓解言辞之书册也。盖西洋。及日本等。皆以言辞。为本。以文字末。与支那等之。以文字。为本者。相反。故谓其解言辞之书。曰辞书

#### 《同文新字典》(1909)

这是一个将辞典编纂与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例子。在讨论这本辞典之前，有必要对当时知识的流动及出版的情况做一些说明。汉字文化圈国家、地区不得不通过日语获得新知识的情况是与日本在亚洲的势力(政治、经济、军事)膨胀密切相关的。“膨胀”遂成为世纪之交汉字文化圈域内的流行词，也是理解当时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的关键词。“膨胀”具体表现在通过军事手段获取殖民地的国土扩张和语言文化方面的“东亚进出”。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推行强制性的“国语政策”，而在中国大陆，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积极提倡译日本书、学日本文，留学日本。对此，日本方面也有所应对，如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对日本《太阳》杂志的记者说：

近来彼国人仰慕欧美文明，欲借鉴东邻同文之国日本近三十年学习欧美的经验；上至政治、法律、经济各科，下及工艺、科学、历史、地理等，频繁购买日本的图书，据日本书加以学习研究的风气渐盛。故抓住时机，翻译日本书输出中国销路必佳。或有清国无版权保护措施，被私自翻刻之虞，但预先与地方官吏交涉，禁止私刻则不难。惟汉文中国乃是正宗，日本人所作汉文瑕疵必多，需要中国人润色修改。但是我相信无需翻译，直接出口日本书也会有较好的销路。实际上现在很多人委托我购买日本书。故暂时翻译成汉文供中国人阅读，将来势必直接阅读日文原文，就像现在的日本人直接读西文书一样。向中国出口图书不但于日本国家极为必要，于个人也是有利之举。(1899.10，原为日文，笔者译)

<sup>11</sup> 原文如此。

<sup>12</sup> 在日语中“辞书”“字书”发音同，“字书”条内容如下：谓解文字之书册也。如尔雅字典等。  
字书

翻译日本图书输入中国,促进日语学习,增加直接阅读日本书的中国读者既有政治上的好处,又有商业上的利益,因此受到了日本政府的鼓励。顺应时世,一时间一批出版社应运而生,如,作新社、国学扶轮社、新智社、泰东同文局等<sup>13</sup>。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东同文局,该局与其他出版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出版社的创办者伊泽修二试图追求更高远的目标。

泰东同文局于1902年7月首先推出了日语教科书《东文易解》,编者在凡例中说:“日东之与中华、固为唇齿辅车之国矣、观宇内之形势、两国宜相亲相结、盖莫急于今日也、而欲其相亲相结、则莫先于意志之相通。意志之相通、则必藉语言为之媒介。此吾所以有是书之著也。”编者大矢透是日本语法学家,他为中国的学习者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语法描写框架<sup>14</sup>。紧接着8月,泰东同文局又出版了《东语初阶》,卷首有伊泽修二的弁言,这是伊泽在一系列出版物上第一次表明自己的主张。弁言写道:“东中交通垂二千载,隋唐时代我学于中,惟时有古今,道有隆污,势会迁流,自不能避。今欲摘撷于遐方者,输引于比邻,敢曰尽东亚之责任。”弁言中还说明该书的日语不同于坊间“贸易家言”,“尤宜于文人学士”,“俾学者习语作文之便,而终吸文明智识于无穷也”。伊泽在这本教材中第一次导入了句型教学法。该书局出版的第三种教科书是《东语真传》(1903年3月),井上哲次郎在序言中写道:“今如中国。亦欲刷新百度。努力经营。以发扬国威。则明治往事。可以为师也。俟期之乎。宜以日本语为关键。而讲究日本书籍。不是独为修西学之捷径。抑亦可见日本当时取舍西学之苦心也。”井上还说泰东同文局的日语书,“近可当交际贸易之便。由此阶梯而登堂。则道德宗教之文章。亦可讲究也。”

这三种按照全新外语教育理念编写的教科书对中国日语教育的建立贡献极大。教科书的出版告一段落之后,伊泽开始酝酿更宏大的计划:汉字统一。为此伊泽创建了汉字统一会,并自任代表。1909年1月泰东同文局出版了《同文新字典》,这是泰东同文局最重要的一种出版物。该字典由伊泽修二策划编纂,并“始终专承监修之任”。稿成之后,日语的内容经文学博士重野安绎、星野恒、井上赖圀、高田忠周审阅;汉语、朝鲜语部分的校阅者分别是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教的张廷彦和俞吉睿。

成立“汉字统一会”、编《同文新字典》,伊泽要统一的是什么?即“汉字”的哪一方面是他意欲统一的目标?字典的前面有汉字统一会会长子爵金子坚太郎及副会长伊泽修二的两个长篇序言(均为汉文);序言后面是“凡例”(日文汉文对照),下面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窥视字典的编纂意图。

金子首先在序言中指出:日清韩三国的“政体思想道德经济实业宗教以及社会上组织等,何莫非由汉学以立基础哉”,“所谓大和民族所发达之真精神,实无一日不恃夫汉学之功者”。有人说汉字难读难懂,想改用罗马字母的文字系统,但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荟萃东西之文化,融和

<sup>13</sup>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51~656页有关于出版机构的更详细的名单。

<sup>14</sup> 永野贤等,“大矢透『東文易解』の編纂意図”,《日本语学》,1993年7月号86~97页





从上面的样条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同文新字典》不过是把三种汉字字典拼合在一起而已。在“统一”和“同文”方面并没有具体的建树。伊泽说“我国从来之汉字音假字使用法，与现今官话音，则虽一见如有大径庭，能寻绎索求其原委，则期间可发见俨然彼我音韵变化之理法存焉。特介日清二音间，以韩音，则其理一曾明晰”，这种学术上的兴趣或是字典编纂的主要动机。

《同文新字典》只对字义加以解释，无法解决复合词形式的新词、译词的问题，也就与新知识的获取无缘。所以尽管《同文新字典》编纂工程浩大，费时费力，但是，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商业上似乎都没有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不同的语言无法统一，记录语言的汉字如果能统一，也只是字形而已。而在国语意识建立后的近代，汉字的“正统性”一旦被“国语”所取代，汉字文化圈域内的汉字字形的统一也已成为不可能。字形尚不能统一，遑论字义、字音？其他出版社在商言商，出版教科书获取利润，而泰东同文局追求的是理想的实现。《同文新字典》在汉字统一的事业上，在商业上都是劳而无功的失败之作。字典出版以后，伊泽把兴趣转向汉语语音学的研究和汉语发音教育方面。1917年4月底将《支那语正音发说明》交付印刷所后不待出版便于5月3日去世，享年67岁。

辞典与教科书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辞典还必须为自学者提供知识。《同文新字典》出版前后，《普通/专门科学日语辞典》（司克熙，欧阳启勋编、1908年）、《东中大辞典》（上海作新社、1908年）等相继出版，主要的日语学习辞典在20世纪的前10年已经基本出齐，日语的自学环境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日语学习以及通过日语获得新知识的努力有了长足进步。其后，中国在英汉辞典、科技术语辞典、国语辞典的编纂上，充分、广泛地参照了日语同类的辞典；日语也以辞典的形式对汉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附记：本文为JFE21世纪财团资助的科研成果之一部。